

黄敬谈民主民生运动

(1942—1945)



中共党史出版社

黄敬谈民主民生运动

(1942—194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敬谈民主民生运动:1942~1945/《黄敬谈民主民生运动》
编委会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098-2806-9

I. ①黄… II. ①黄… III. ①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民主运动—文集 IV. ①K269.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3897 号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 江

复 审:李亚平

终 审:汪晓军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64mm×230mm 1/16

字 数:140千字

印 张:12.75

印 数:1—10000册

版 次: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2806-9

定 价:25.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黄 敬

黄敬，汉族，1913年9月出生，浙江绍兴人，原名俞启威，又名俞大卫，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大学文化。

早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汇文中学。1930年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31年考入青岛大学（后改称山东大学）物理系。1933年夏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同年秋经营救救出狱。曾任山东大学中共地下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1935年后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36年4月起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学委书记。1937年2月起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至1938年4月任中共晋察冀省委书记，1938年起任冀中区党委书记，1939年2月起任冀中军政委员会委员。1942年10月起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宣传部部长，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1943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书记，1944年5月起任中共冀南工委党校校长。解放战争期间，1946年起任晋察冀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常委、第三副书记，晋察冀军区第四副政治委员。1948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华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治委员，华北人民政府国营企业部部长。1948年12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副书记、天津市市长、天津军管会副主任、主任。1949年5月至1953年4月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1952年8月至1958年2月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53年5月起）。1956年5月至1958年2月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57年4月起）。1957年起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1958年2月10日在广州逝世。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本书编委会

主 任：朱加云

副主任（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龙嘉 王雷亭 任尚显 贾鹏柱

主 编：丁龙嘉

副主编：任尚显 贾鹏柱

编 辑：刘清章 顾 磊 鞠洪奎 马士祥

郝忠杰 刘黎辉

编辑说明

本书收集的黄敬谈民主民生运动的12篇文稿，内中有5篇是会议报告、5篇是会议发言、2篇是文章。其中的部分会议报告、发言是纪录稿，有的当时未经本人审阅，而至20世纪80年代出版时已无法请本人审阅了（黄敬于1958年逝世）。编辑为了如实反映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对本书收入的文献一般不予变动，只对明显的错别字和不规范的标点符号加以改正，对不清晰的或脱落的字用“□”表示，对较多不清晰的或脱落的字用省略号标出，对增补的漏字用“[]”标明。

目 录

导 读

——一部抗击日寇、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协奏曲的强音节 1

冀鲁豫边区的形势与任务（节选）

（1942年12月） 13

濮县范县四个月群众工作总结

（1943年1月） 28

加强我们党报的党性

（1943年3月31日） 61

在濮县范县工作大会上的发言

（1943年4月） 65

整风随笔

（1943年5月） 89

关于领导问题的报告

（1943年6月20日） 96

今后的四大任务

（1943年11月26日） 110

在冀南区中共地委书记联席会群众工作 座谈会上的发言 (1943年12月)	114
反对官僚主义 (1944年1月13日)	118
在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第二地委关于发动群众 及目前中心工作问题的发言 (1944年4月25日)	137
在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整风中心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1944年4月)	150
发动群众中的几个问题 (1944年11月)	154
附 录	
中共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 (1939年11月1日)	160
中共中央北方局对目前冀鲁豫边区工作的指示 (1942年6月30日)	164
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冀鲁豫边区党委军区工作的指示 (1942年10月20日)	168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冀鲁豫根据地工作给北方局的指示 (1945年1月23日)	175
在中共冀鲁豫分局群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1945年6月6日)	176

导 读

——一部抗击日寇、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协奏曲的强音节

丁龙嘉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一百六十六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对西欧历史与现实的考察而得出的这一结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后，共产党人在欧洲西部资本主义国家领导的“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走过了艰难而曲折的历程，而共产党人在亚洲东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领导的“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走过了更为艰难而曲折的历程。

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在中国黄河冲积平原上的硝烟弥漫的敌后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开展起一场“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民主民生运动。这场民主民生运动的主要指导者是时任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中央冀鲁豫分局书记的黄敬，他在工作中阐述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的思想观点。这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思想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着启示意义。

一、冀鲁豫边区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时代背景和轨迹

冀鲁豫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抗日战争中逐步形成的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位于冀、鲁、豫、苏、皖五省接壤地带，至1945年初时“为敌后最大根据地”。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创立了鲁西平原抗日根据地，冀鲁豫省委和之后的冀南区党委领导创立了冀鲁豫边平原抗日根据地。进入1941年，两根据地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抗日形势十分严峻。为了统一对敌斗争力量，坚持平原抗战，经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并报中央同意，两根据地于1941年7月合并为新的冀鲁豫边区，党军政领导机关设在今山东省莘县的红庙一带。边区党委，由张霖之任书记，张玺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承先任宣传部长。两区所属的主力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由杨得志任司令员，杨勇任副司令员；两区所属的军区地方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冀鲁豫边军区，由崔田民任司令员；苏振华任纵队兼军区政治委员。边区行署，由晁哲甫任主任，段君毅、贾心斋任副主任。在此后一年多中，边区领导人努力探索转变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方针，以求打破被动局面，但终未能达到目的。

1942年6月30日，北方局发出《对目前冀鲁豫边区工作的指示》，指出冀鲁豫边区“已进入空前困难时期”，要“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同时指出“边区过去工作薄弱之处，是群众未曾较好地发动”，强调“发动群众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9月中旬，路过边区西返延安的刘少奇，批评边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不够，并详尽地阐述了没有群众就没有根据地，群众工作必须依靠基本群

众的道理。10月20日，北方局再次发出《对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工作的指示》，进一步指出边区的“基本群众未得到应有的民主民生利益，因此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程度，未得到应有的成绩”，强调巩固根据地的“中心一环是发动群众”，“党必须以全部力量进行这一工作，如群众不发动，则一切工作都无依靠”；并决定调原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任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

历史已经证明，北方局和刘少奇的这些批评是正确的。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八路军要在华北敌后坚持长期抗战并且取得胜利，就必须依靠自身战略、政策的正确和广大群众的支持。而要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须进行广泛且深入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而要动员和组织群众，就必须使群众得到实际利益和权力，且使这些利益和权力同抗日联系起来。而要使群众得到利益和权力，就必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对于这样一个正确的逻辑关系，虽然各级领导人的认识，在时间上有早有迟，在程度上有深有浅，但是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边各个根据地，发动群众不够，带有普遍性。邓小平在1945年6月指出：“晋冀鲁豫区过去最沉痛的教训是在1940年、1941年没有真正执行中央1939年冬天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这影响到我们根据地工作的深入和巩固的程度”。

黄敬到任后，立即进行了调查研究，接着主持召开了边区高干会议。他根据北方局和刘少奇的指示，结合自己调研得到的认识，作了题为《边区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有三点，一是针对日伪会匪顽五鬼联合闹中原的局势，提出了拆散五鬼联合的策略方针；二是针对发动群众不够的缺点，提出了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中心任务；三是针对对敌斗争被动的局面，提出了开展高度分散的敌后游击战争、实行敌

进我进的军事方针。与会人员通过深入讨论，在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共识。这个报告，是边区历史上的一篇经典文献。这次会议，是边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一次走向胜利的转折性的会议。

在边区召开高干会议之时，区党委组织了五百人的政民工作队在运西地区的濮县、范县开展民主民生运动试点工作。民主民生运动的内容是，反贪污，查黑地，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增资、增佃；改造村政权。这实质是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削弱封建势力，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试点工作历时四五个月，之后，进行总结。接着在边区的中心区由点到面逐步展开民主民生运动。在1943年一年的运动中，农村的封建顽固势力受到了削弱，中间势力发生了分化，基本群众初步提高了觉悟并部分获得了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从而使共产党、八路军得到了多数群众的拥护。群众形容说：“送葬的掉了裤子，有哭的，有笑的，还是笑的多！”举两个例子加以对比：在1943年之前的反击日伪军“扫荡”中，曾出现过老百姓活埋八路军和抗日政府人员的事情。而在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老百姓为了不让日伪军把掠夺的粮食运走，就趁黑夜将沙子撒在粮食上，待日伪军丢弃有沙子的粮食撤走后，再把粮食筛出来送给八路军部队和抗日政府。

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冀鲁豫分局，又称平原分局，辖冀鲁豫边和冀南两个区党委，之后，撤销两个区党委，直辖12个地委。冀鲁豫分局，由黄敬任书记，宋任穷任组织部长，李菁玉任宣传部长，张霖之任民运部长，张玺任秘书长。两区的军区合并后，由宋任穷任司令员，王宏坤、杨勇任副司令员，黄敬兼任政治委员，苏振华任副政治委员。两区的行署合并后，由孟夫唐任主任，徐达本、贾心斋为副主任。从1943年冬至1944年春，冀鲁豫分局指示将工作中心由民主民生运动转入农业生产，但是却受到了农民的冷淡。黄敬通过实地调查后认为，群众情绪消沉、表现冷淡，

主要原因是，在民主民生运动中，发动群众不放手，实行包办代替，束缚了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没有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结果工作队一撤离，群众工作陷入消沉，而此时不能容忍改革的顽固地主则趁机反攻倒算；出现这种局面，对于干部来说，归根到底是没有确立正确的群众观。不久，分局否定了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针，决定继续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纠正“包办代替”，实行“大胆放手”，从群众切身利益和现有政治经验出发，将群众发动起来。从“包办代替”到“大胆放手”，这不只是个方法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个是否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念的转变。在实行“大胆放手”的过程中，分局纠正了认为“大胆”就是“盲干”、“放手”就是“放任”的错误观点，以及严重伤害中农、过分打击富农、过重打击地主的“左”的错误倾向。出现这些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的重要原因，是突破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底线。

在民主民生运动中，全边区的12个地区中涌现出两个热点地区，一个是运西地区，一个是直南豫北地区。1943年初春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由试点向面上展开时，两地区党委的班子在精兵简政和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中进行了调整。在运西地委，由段君毅任书记，万里由书记改任副书记，主要抓民主民生运动。在直南豫北地委，由张玺、张国华先后任书记，赵紫阳由书记改任副书记，主要抓民主民生运动。

民主民生运动和军事斗争等促进边区在1943年走出了低谷、1944年得到了极大发展，至年底，有人口将近两千万，成为敌后最大抗日根据地。此时，黄敬积劳成疾，经中央同意离职休养，由宋任穷代冀鲁豫分局书记、兼代军区政治委员。1945年3月，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率领北方局机关人员来到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指导民主民生运动，求得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发展。

二、黄敬指导冀鲁豫边区民主民生运动实践中的 基本思想观点及特色

黄敬在指导边区民主民生运动中的一些基本思想观点，值得我们思考、研究。

关于根据地建设中的民主民生与抗日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在根据地建设上，应改善民生，开展民主，发动群众斗争，并使基本群众在各阶层中取得优势”，“只有把群众从切身的斗争中逐步提到民主斗争与抗日斗争中来，才能由下而上彻底改造政权，彻底实行民主；才能发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关于民主与民生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反贪污，查黑地、实行合理负担，表面上看是民生斗争，实际上是民主斗争，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政治斗争。但民主斗争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是为了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封建主义的剥削，结果还是经济利益，但不等于经济利益。”

关于民主民生运动中的包办代替问题，他指出，“群众工作的基本毛病是包办代替”，“包办代替，一层层障碍着我们，这样，结果是广大群众呼声上不来了”；“自下而上，就是从群众中集中上来，自上而下，就是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真正深入的群众运动，应是群众大多数的自觉的运动”。

关于民主民生运动中出现包办代替的思想文化根源问题，他直指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他说，这种思想文化“努力培养主与奴、英雄与狗熊的双重人格”，把每个人都当“英雄”，即主子，又把每个人都当狗熊，即“奴才”。他指出，在这种思想文化熏陶之下，封建官僚队伍的成员有一个明显的标志：上谄下骄。对上司，是一个可怜的奴才；对下级，又是一个威严的

主子。所以，往上看，服从一层比一层恭顺，统治也一层比一层“和平”；往下看，压迫一层比一层凶狠，痛苦也一层比一层沉重。他又指出，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是迷信和武断，它造就各色各样的“英雄”偶像让“奴才”迷信地崇拜着，有了这种迷信的崇拜，就可以使人们对新事物采取武断的拒绝。这种思想文化上的迷信和武断，造就了无数的“愚民”。众多的“愚民”就顽固地保守着社会现状。于是，这个世界虽然是活的，但是人们的思想却死了。数千年来，中国人民就生活在这死水一般的黑暗、贫困、愚昧的社会之中。

关于依靠什么打破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堡垒、解放群众思想的问题，他指出：“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把这数千年来的反动的思想堡垒打开，把中国从黑暗中解放出来。”那么，什么是民主主义呢？他以最通俗的语言告诉人们，“一句话，就是用平等的精神来待人”。他坚定地指出，“民主主义是一切胜利的保证”，并号召以民主主义造就“抗日公民”。

关于如何用民主精神启发群众思想、发动群众的问题，他指出：“须知道，中国社会没有民主生活，文化低下，封建的等级与守旧的思想还牢固地统治着人心。当要领导他们起来斗争的时候，他们充满着怀疑、畏缩、犹豫与依赖的心理。必须用民主的精神去耐心地进行宣传与教育，从思想上进行启发，把它们一关一关地打破，才能把他们真正地发动起来。”他又指出：“革命的群众有着独立的思想 and 人格，任何革命思想不是可以强制灌进去的，强奸民意，自古以来就没有行通。思想，只有在民主的生活中才能启发，在自己切身的经验中才能深刻。也只有民主，群众才能充分认清自己的力量，不再犹豫、畏缩，一切要依靠自己，不再依靠旁人，敢于自己去进行斗争；在遇到困难与挫折时，才能有力量去冲破它，把斗争坚持到底。许多同志不懂得这一点。”他特别指出，共产党人要把领导和统治二者区

别清楚，有的同志“把领导和统治混淆不分，认为领导就是统治。不懂得统治是对敌人的一种强制的压迫，而领导是对自己队伍的一种民主的引导。前者是依靠暴力的强制，后者是依靠自觉的服从。两者界限非常清楚，含混不得的”；“用统治者强制的办法对待群众，对待自己，不论主观动机好坏，群众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无论如何是发扬不起来的”。

黄敬指导冀鲁豫边区民主民生运动实践中的基本思想观点，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色，即深刻剖析了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文化的毒害，有力传播了“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把中国从这黑暗的思想牢笼里解放出来的思想。从文化的维度，批评民主民生运动中的包办代替的思想、作风，批评抗日根据地中的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这在当时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中，是很少见的。黄敬能够从文化的维度深刻认识问题，与他的阅历和文化素养密不可分。他早年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汇文中学读书，1930年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求学期间，曾任学校中共地下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参与领导青岛的左翼文化运动。他曾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青岛的新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参与组织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青岛分盟小组——海鸥剧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四项任务之一是发展大众文化的理论与实际，加紧大众化作品的创作，海鸥剧社曾深入工人居住区和农村进行演出。黄敬后来又在北京大学求学。

黄敬就是这样全身心地指导敌后最大抗日根据地中一场引起社会深刻变化的民主民生运动的。这时，他虽然年富力强，1944年时仅31岁，但也积劳成疾，不得不离开近两千万抗日根据地民众而于1945年初赴延安疗养。在边区的两年多中，这位在山东大学、北京大学读过书的不多见的党内干部，不是站在群众之上的权贵者、群众之后的尾巴者、群众之外的冷漠者，也不是民粹主义的煽动者，而是站在群众之中、之前，从群众现有的政